

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

编者按

文学评论是对文学作品进行质量鉴别、价值探究和意义阐发的创造性活动,是引导文学创作、提高艺术审美、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。当代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文学事业发展进程,深耕文学现场,就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进行了及时的关注。同时也存在诸如表扬有余、批评不足,套用西方理论术语进行“强制阐释”,文风不够清新自然等问题,影响了文学评论的有效性。为了促进文学评论的健康发展,今日起本版开设“如何让文学评论更有力量”栏目,邀请专家学者集中梳理文学评论面临的突出问题,并提出建设性意见,以提高战斗力和说服力。

回到文本 面向读者

——关于当下文学批评的几点看法

□ 於可训

最近一个时期,大家对文学批评颇多非议。不满意的问题,有多个方面,最突出的是商业化的广告批评、庸俗化的人情批评。这些问题不仅见于各式各样的新书炒作和应景式的作品研讨,包括为人们所诟病的“红包批评”等,败坏了文学批评的风气,污染了文学创造的环境。更为严重的是,这种假文学批评之名进行的所谓文学批评活动,背离了文学文本,疏远了文学读者,把本来应该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起桥梁,成为文学与社会的中介物的文学批评,变成某些批评家叫卖式的吆喝,或某些批评家小圈子沙龙式的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。

义在文先、文为义证、义不及文:小心文学评论掉入意义模式的陷阱

文学批评要从文学文本出发,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。被今天的学者视为文学批评基本原则的“知人论世”,在孟子那里,就是从“诵其诗,读其书”,也就是从文本阅读开始的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来就重视对文本的精研细读,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要样式的诗话、词话、小说评点,都是如此。朱熹甚至对一首诗的阅读,进行了技术上五的要求,说先要看诗吟咏四五十遍了,方可看注,然后再吟咏三四十遍,“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,方有见处”。西方文学批评,也不例外。尤其是20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派,更是以文本的“细读”为主张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,如恩格斯,在文学批评活动中,也十分重视对文本的阅读,他在对拉萨尔的剧本《济金根》表达评论意见之前,把这部作品读了四遍。在读完一两遍之后,为了验证最初的阅读感受,使自己有一个“完全公正、完全批判的”态度”,还有意识地把作品往后“放一放”,直到读完三四遍之后,印象依旧,才告知自己的批评意见。这样做,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尊重,也是严肃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应采取的态度。现代阐释学兴起之后,对文学作品的阐释,由追寻作者

批评家过度以专业兴趣左右读者的感受和思考,进行“强制阐释”,让读者敬而远之

对文学文本的阅读,同时也是一个批评伦理问题,即文学批评是以批评家为本位,还是以读者为本位。文学批评从来就不是自说自话。在中国古代,文学批评被认为是在寻找“知音”,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就专章讨论“知音”问题。西方有学者则认为,文学活动仅有作家和“某个特定的读者”(批评家)的关系,还不能“超脱私人的范围”,只有当“第三者”即“读者公众”介入的时候,文学才能“进入社会领域”,对人群发生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文学批评只有面向读者,才能显示出它特有的意义和价值。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,尤其是在具有公共文学空间的近现代中国社会,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,从来就是引领公众的一种社会力量。我国从近代社会改良到现代中国社会革命,文学批评都充当了开启民智、唤醒觉悟的工具。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时期,则成了战斗的武器和号角。西方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中的文学批评,一直处于引领社会思想潮流的地位,尤其是俄国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,对俄国社会结束农奴制,发生转型和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在当代中国社会,文学批评在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与其他人文学科不同,文学影响于人的社会文化思想,不是以直白的方式告诉读者,而是隐含在具体的文学形象之中。因此,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意义阐释,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读者从具体的文学形象中,固然也能直接受到“熏、浸、刺、提”的感发振作作用,但要从中得到理性的认识和启示,就离不开文学批评家的工作。西方有批评家说:“批评之所以存在,就是为了说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。”没有这种“说明”,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就只是一个“狂人”的胡言乱语,《祝福》《孔乙己》和《阿Q正传》等作品主人公的遭遇,也只能博人同情,都不可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。当代的一些红色经典,如《青春之歌》《红旗谱》《林海雪原》和《红岩》等,也只是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,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,却不可能让人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,更不可能激励今人的革命精神和斗志。文学批评向读者揭示文学作品的专业兴趣和感受,而不是生硬拼贴,而是依靠批评家对读者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的了解。在整个文学批评活动进程中,批评家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接受者,参与普通读者的文学接受活动,而后才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,把从文学接受活动中所得的经验和感受,进行归纳、提炼,上升到理性高度,形成批评意见。在这种情况下,批评家告诉读者公众的,就不应该是自己的主观好恶,而应该是根据一个时代的“普遍的理性法则”(别林斯基语),对文学作品所进行的判断和评价。这种“普遍的理性法则”,就包含这个时代读者公众的意志、愿望和要求,包括他们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倾向等。这就需要批评家站在时代的高度,深入了解现实关系和各种变动,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,把对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的思考,凝聚成一种理性的判断力,以之作了解读作品、评论得失的思想利器。文学批评被人称之为“运动着的美学”,也是这个意思。也只有在上述意义上,文学批评家才称得上是一个“有思想的人”,或如普列汉诺夫所说,“既是美学家,又是思想家”。批评家

呈现童年的广阔风景

——读《外婆说我是窝里横》

□ 谈凤霞

通读孙卫卫的《外婆说我是窝里横》(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),发现似乎任何一件童年小事都可以进入他的“法眼”。这种目光是双重的,成年的他透过儿时的他去还原过往的模样,品尝个中滋味——既有彼时彼地的感觉,也渗透此时此地的感慨。有些趣事让人忍俊不禁,有些故事则引人深思。他坦诚地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所作所为,毫不避讳地述说自己的弱点和错误。比如,其中一篇讲自己内外判若两人的做法,结尾与现在的对比,明白了不懂爱的方式家庭教育问题,更看到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问题,“家里人对我那么好,如果我为他们好欺负,我还是人吗?我自始至终都看不起窝里横的人”。直面曾经的不完美,才会获得超越的方向和勇气。

当文学书写融合了童年往事与时代风云,它就不仅仅只是个人童年记忆的记录,而是成为一代人乃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。《外婆说我是窝里横》的格局,是以回望个人童年来路,呈现一个特定时代的“中国式童年”的广阔风景。这个时代是当代孩子所陌生的,但是需要去感知和思考的,因为成长从来不是断代式的,而是在对之前时代的触摸中,去领会那个时代的苦与乐,去辨别那个场域中的是与非,去审慎地接续那个绵延下来的中国式亲情、民风和气脉。孙卫卫从一个懵懂而又认真的孩子的视角,去看待那段社会历史的光影和留下的轨迹。他写人们的作为和选择,写大孩子“颗粒归仓”的自豪。但他没有把乡村美化成鸡犬相闻、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,而是会提及邻里之间时有发生得纷争恩怨,写乡村的风俗甚至陋习,写人们在贫穷学校中体现出的情谊和姿态。他也写那个时期学校教育中的风气,写出了作为学生的喜与忧、爱与恨……他书写着一个困苦甚至不无辛酸的时代以及人们的命运,同时也满怀感恩地表现那个时代里依然富足的暖意与希望,正是这些共同哺育了一个乡土生命和灵魂的成长——懂得艰难,更懂得如何在艰难中秉持正直、关怀、谨慎并奋发图强。

《外婆说我是窝里横》尽管写的是乡村,但孙卫卫没有沿袭乡土文学的抒情派传统,而是选择了写实,所以他不求浪漫化、诗意化,即便在回首往事时,因为沧海桑田的变化,难免会有所伤感,他也把伤感蒸馏过滤。他自觉地避免有可能显得矫情、滥情的手法,用一支自然之笔,饱蘸生活的墨水,诚恳地写下他的“心里话”,就像是把读者当作可以交心的朋友般讲古、拉家常。不过,他的话并不多,对于事件从不屑于去细加描摹,只是白描式地说着,甚至不去使用形容词,而那朴素的声音愈发显得坚实、有力,一句是一句,让人觉得不能漏听一句,否则就不完整,不够味。要达到这样的境界,需要精深的语言功力。无论为人,还是为文,“克制”是我们学习的一门极有难度的功课。孙卫卫深谙艺术之堂奥,在散文写作中,自觉地磨炼这种品质,努力做到长话短说,尽量不动声色,留给读者去体验和玩味。他的语言追求简劲,同时也发掘内在的趣味。在速写般的勾勒中,同样能传递真切的面面感、氛围感和含蓄的情感,也传递那份能跃然纸上的童年精气神。回望童年,谁若能看得深、看得广、看得准、看得透,看得欢喜、看得感激也看得心疼,那么,经过这种目光凝视的童年往事,进入文字时就有可能呈现其本色、本相与本质。孙卫卫对童年不断地眺望和怀念,有其深情,也有其审视。他在“后记”中说:“现在看,它们像乡间小路上的小花小草一样,默默无闻,岁岁枯荣,但是,当年在我心目中却有极重要的地位,它们深深影响着我。下一代正在长大,我记下这些,也是想告诉他们,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我希望他们更幸福。”这段朴素而诚挚的话,可以看作他“筑路”的用意。他用精心打磨的文字鹅卵石,铺就一条连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道路,我们赤脚踩上去,感受那些鹅卵石的形体和力度,得以摩挲“穴位”,感觉脚底生热、气脉通畅,步伐也会更为踏实而矫健。

“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”

——对诗人冯至传记的观察

□ 马文巍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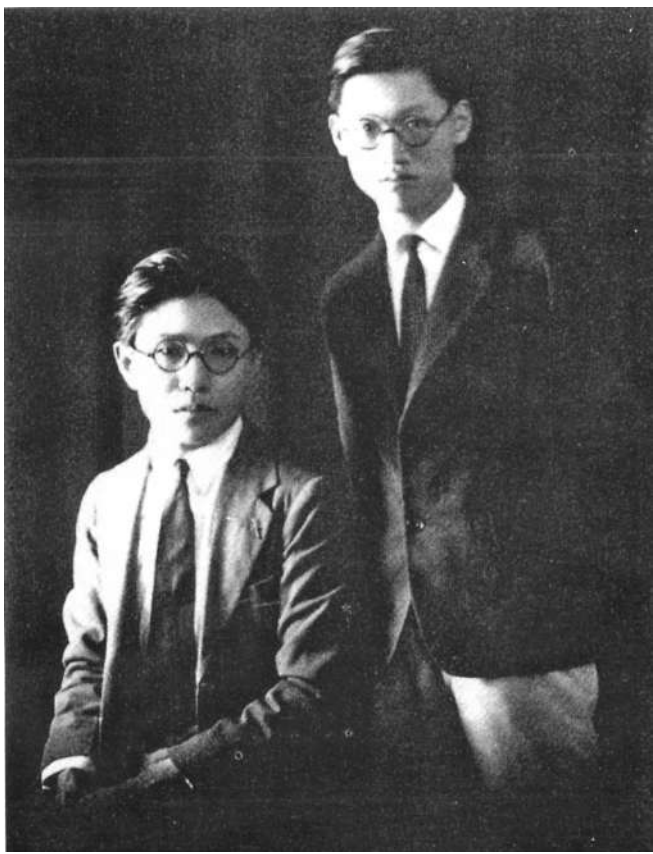
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,冯至的创造和贡献显而易见。如何还原冯至的诗性人生,把握诗人冯至与学者冯至、思想家冯至等多重角色之间的关联,全面考量冯至的文学轨迹和命运,是冯至传记不可忽视的问题。王邵军的《生命的思与诗——冯至的人生与创作》(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),沉潜到冯至生活的原始样态和本真的思想轨迹,吟诵出一首扣人心弦的生命史诗。冯至提倡通过作品把握诗人



1927年出版的冯至第一本诗集。

的生平,他的著作《杜甫传》以“杜解杜”而闻名,借助于杜甫的诗作,尽可能地还原杜甫的时代图景、文学现场和生命历程。他在《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》中说:“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来研究,把诗人的生活做一个详细的叙述。”王邵军或有意或无意地师法冯至,在创作过程中秉持“以冯解冯”的方法论,从冯至的创作着眼,抽丝剥茧,探寻冯至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轨迹。他精心提取冯至生命中重要时期的关键性事件,勾勒他一生的大致走向,同时努力还原其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。王邵军积极借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、视角和方法,试图重返冯至所处的独特历史语境下的地理环境、家族和家庭环境、社交圈等“场景”,探索生动准确的生命现场和思想精神轨迹。诗歌是人类的伟大创造,能在有限的字句之中潜藏无限的情与思,是诗人精神世界的通关密码。王邵军以学理性的眼光观照和解构冯至的生平及创作,“以冯解冯”,同时积极借鉴文学地理学的理论、视角和方法,回归到冯至经历和创造的生命现场探求真相,既不失诗人传记的风貌,又兼具学术著作的体统。文学性追求的是情感的温

度。传记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,创作者沉潜到传主的生命长河之中,设身处地、用第一人称视角观照他的生活和思想。换句话说,人物传记,尤其是文人传记,要求创作者对传主共情,即“理解之同情”。王邵军致力于探寻冯至的内心世界,他清楚地看到冯至的寂寞、忧郁、孤独,以及静默深沉的坚守,而这些恰恰是冯至之所以成为冯至的依凭。冯至的女儿冯姚平说过,父亲“一生低调、平平凡凡,毫无传奇色彩,读书、思考、教书、写作填充了他的一生”,还说“好像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”。唐人常以“镜”比拟湖的“波澜不惊”,回望冯至的一生,恰似一面宁静的湖泊,湖水流转往复,“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”。20世纪的风云变幻,冯至始终没有停止思索的脚步。从早期的孤独,到对孤独的克服,到隐忍、坚守、蜕变,再到“人民性”,冯至终其一生的都在思考、在探索。王邵军敏锐地把握住冯至的创造与生命体验、形而上思考的良性互动关系,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深入研究和深度阐释,成功构建一个作为精神探索者的冯至形象。面对歌德、杜甫等研究对象,冯



1930年,冯至(左)与散文家梁遇春合影。

至以难能可贵的耐心,深入思考,细致体悟,从不同角度搭建起与之对应的精神空间。可以说,冯至的精神探索之路,将生命和创造紧密交织在一起,使诗人冯至与学者冯至、翻译家冯至、思想家冯至等侧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。《生命的思与诗》尽可能地展示冯至的各个侧面,以他的精神探索之路为主线,打通各个身份之间

的互动和联系。冯至一生低调内敛,不逐喧哗,静默守持,于沉思中体味平凡生活的深意,探寻现实人生的内在哲理,并自觉上升到生命哲学的层面,就像是一条小河,流过森林和花丛,历经海上的风涛和狂妄,最终凝汇成一片深邃安谧的湖。(作者分别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、文学院教授)

(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